



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

胡永杰

摘要:杜甫在洛阳一带的居处可知者有陆浑庄和土娄庄,他早年主要居住在陆浑庄,约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移居土娄庄。杜甫移居土娄庄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为父守制,但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由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的心态转变。其实唐代文人在洛阳或长安周边营建两处或多处别业,以满足隐居或在仕求仕等不同状态及心态下的需求,这一现象并不罕见,杜甫移居之举和当时这一风气应该说是相通的。

关键词:杜甫;陆浑庄;土娄庄;移居;心态转变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20)01-0122-07

杜甫在洛阳一带的居所,可知者有两处,即陆浑庄和土娄庄。以前论者多认为陆浑庄即土娄庄,两者乃为一处^①;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两者并非一处,陆浑庄应在洛城之南陆浑山一带者也偶有之^②。笔者同意后一种看法,陆浑庄和土娄庄应为两处别业,它们是杜甫在洛阳一带生活时的主要居处^③。杜甫早年主要居住在陆浑庄,约开元二十九年始在首阳山下筑土娄庄,移居于此。杜甫从陆浑庄移居土娄庄,直接原因可能是其父去世之故^④。但守制期间进一步庐于墓旁并不是唐代文人中的普遍风气,而且移居土娄庄后,杜甫在洛阳时一直居住于此,直至安史之乱发生,达十多年之久^⑤,已远远超过守制的三年之限。所以他移居的背后当还有家庭变故导致心态变化的原因,即父亲的去世促使他不得不正式规划自己的人生,把早已有之的“会当凌绝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付之实践,心态由追求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当时两京文人在都城外围营建两处或多处别业,以满足在仕求仕或隐居高蹈等不同状态下的居住需求,这一现象并不罕见,由此来看,杜甫从陆浑庄移居

到土娄庄,也是一种向洛城靠近,为入仕做准备的行为。

一、遨游宿南山:杜甫居住陆浑庄时的生活及心态

(一)再谈陆浑庄的所在

杜甫的陆浑庄仅见于《忆弟二首》诗题下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1]1233}其中“河南陆浑庄”,宋代注本皆作“南陆浑庄”^⑥。此题下注,或以为是杜甫自注,或以为是北宋王洙所注,洪业先生则认为是1113年(北宋政和三年)王得臣所加,后被误归于王洙注,再后被误认为是杜甫自注^{[2]37}。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北宋时注者即认为杜甫有陆浑庄,乾元二年(759年)他在洛阳所归之处就是这个陆浑庄。那么,杜甫的陆浑庄在何处?笔者曾撰《杜甫陆浑庄即尸乡土室(土娄庄)说质疑》一文,怀疑其在洛城之南的陆浑山一带。关于此,从杜甫的叙述中还可做一些补充。杜甫在夔州时有《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一诗:“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1]5052}言

收稿日期:2019-12-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洛阳文学空间研究”(18BZW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永杰,男,文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河南郑州 450002),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自从安史之乱发生后没有再到过土娄旧庄,但《忆弟二首》却是乾元二年春,即丧乱之后“归在南陆浑庄”所作。可证陆浑庄、土娄庄实非一处。杜甫还在《遣兴三首》中云:“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岂无柴门归,欲出畏虎狼。”(其一)“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其二)“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其三)^{[1]1197-1202}这组诗当是乾元元年在华州作,即归东都陆浑庄探望前不久作。他归陆浑庄后所作的《忆弟二首》其二也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1]1235}这些诗中所云“柴门”“故宅”“故园”当都指陆浑庄。而《遣兴三首》其三云“昔在洛阳时”“遨游宿南山”,可见杜甫在南山有住处,南山当指洛城之南山中,应是陆浑山一带。这个南山中的居处当为陆浑庄,而非洛城之东首阳山的土娄庄。此外,还可从杜甫《龙门》中窥得一些线索:

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往还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1]73-74}

从“相阅征途上”“往还时屡改”可见杜甫经常途经龙门。那么他为何要屡屡路过这里?应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从洛阳城内外出,途经龙门;二是他在龙门之南居住,往返洛城内或远赴外地需经过这里。如果杜甫不住在龙门之南,他远赴外地其实不可能经过龙门。

从洛阳东行、北行,路途皆不过龙门,这显而易见,不用赘言。从洛阳西行赴长安是否需经过龙门,则需略作考辨。据严耕望先生考,唐代长安、洛阳之间的驿道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由长安至陕州,经澠池、新安至洛阳,相当于今天陇海铁路一线;南线,长安至陕州一段与北线相同,但陕州至洛阳一段则偏南东行,经永宁县(今洛阳洛宁县北),然后沿洛水经福昌县、寿安县(今洛阳宜阳县附近)到洛城内。并指出,南线乃唐代君主巡幸所走的道路,为主线,北线则为行军所经,盖取其捷径。但乾元元年(758年)末、二年春杜甫从华州至洛阳,又从洛阳返回华州,走的则是北线,此从“三吏三别”等诗可知^{[3]51-89}。可见,即便是南线,乃是沿洛水出入洛阳城内,而龙门在洛水东南的伊水,并不在两京道上。所以杜甫西行之长安,东行之梁宋、齐鲁、吴越,北

行之晋地,如从洛阳城内出发,均不可能经过龙门。当然,从洛阳向南远行,也有三条道路,即伊阙、太谷、轩辕三关道^{[3]1831-1832}。龙门所在的伊阙关之道是从洛阳通往汝州、南阳、襄阳等地的主要通道,但是从杜甫一生的行迹看,他并没有从洛阳南行到外地的经历。

所以,杜甫云“相阅征途上”“往还时屡改”只能作第二种解释,即他居住在龙门之南,到洛阳城内或远行到外地,往返需经过龙门。这个居处应当就是在陆浑山一带的陆浑庄。

(二)杜甫居住陆浑庄时期的生活和心态

杜甫开元二十九年之前在洛阳一带的居所可能并不限于陆浑庄一处。《百忧集行》中云:“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1]2353}这里提到他少年时的居处,这个居处是否就是陆浑庄,不得而知。《壮游》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1]4084}可知他十四五岁时主要在洛阳城内活动^⑦,而且他的祖父、父亲长期为官,在洛阳城内营置宅第应非难事。这个“庭前八月梨枣熟”的住所应在城内为宜。但从前引《龙门》诗“往还时屡改”“相阅征途上”的描述看,他青年时期在洛阳时则主要居住在陆浑庄。

至于杜甫在陆浑庄生活的情形,当如《遣兴三首》其三所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乃是一种遨游栖隐、交游雅集的生活。我们知道,杜甫早年并不急于出仕,35岁(天宝五载)之前主要过着隐居漫游的生活。这种状态和心态下,他应不喜居住在城内,而是更乐意在附近的山庄中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这是当时洛阳文人中常见的现象。如杜甫的老友房琯:“性好隐遁,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4]3320}房琯入仕前就和吕向居住在陆浑山一带山中,追求山庄隐居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杜甫传》载:“房琯布衣时与甫善。”^{[4]5054}房琯开元十二年被授予了秘书省校书郎,“布衣时”应在此前,这时杜甫才十三岁。他们相识交往有可能就是在共同居住陆浑山中时。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也有早年隐居的经历,

武后时期他和宋之问、道士司马承祯等曾在嵩山结为“方外十友”^{[5]4239}。杜甫早年不急于出仕,显然也热衷于这样的生活,除在外地漫游外,在洛阳居住当以隐居为主,如《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记述韦济打听他的情况云:“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1]161}杜甫早年为追求隐居生活而主要居住于陆浑庄,当是情理中事。

二、二年客东都:杜甫移居土娄庄后生活及心态的变化

把陆浑庄和土娄庄视为一处,不但在地理位置上不合,而且从他全家的居住情况来看也不合适。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云“小子筑室首阳之下”^{[1]6294},祭文作于开元二十九年寒食节,筑室应始于这年初或上年,可见这个土娄庄乃是杜甫后来所筑,仅是几间窑洞(据杜甫又称之为“尸乡土室”可知)。陆浑庄则是其全家所共居,如乾元二年杜甫归在东都陆浑庄时所作的《得舍弟消息》诗云:“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1]1238}诗中提及其弟居住的情况,还提到家里的旧犬,可见陆浑庄并非杜甫独居之处,乃一家人共同所居,当有不小的规模。它不可能迟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或二十九年才营建,更可能杜审言时就已有之,至少杜甫筑建土娄庄时就已经“往来时屡改”,常常途经龙门往返于陆浑庄。开元二十九年土娄庄筑成后,杜甫在洛阳的主要居处也就转移到了这里,如约作于天宝七载(748年)至九载(750年)间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云:“尸乡余土室,难说祝鸡翁。”题下注云:“甫敝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1]161}结合他所云:“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可知直至安史之乱前,杜甫从长安返洛阳,依旧住在土娄庄。

杜甫为什么营建土娄庄?有论者怀疑可能与其父杜闲去世有关^{[2]35}。但应注意的是,杜甫筑室、移居于此其实有两重目的:一可能是守墓,二是为仕进做准备。杜甫在此时所作诗文中并没有透露守墓的目的,但准备转向仕进之途的心态却屡有表露。

(一)祭祖与表露心迹

杜甫移居土娄庄后,专门祭奠了他的远祖

杜预和外祖父、外祖母。《祭远祖当阳君文》云:“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月日,十三叶孙甫,谨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晋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之灵。”又云:“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1]6294}祭文应是他在移居土娄庄后的第一个寒食节祭奠杜预所作,既表达了对远祖的敬仰、怀念,也表达了要继承其志业的心愿。《祭外祖祖母文》云:“维年月日,外孙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灵。”^{[1]6301}祭奠外祖、外祖母在洛城之北的邙山,时间也是春三月的寒食节,当在祭杜预之后不久,杜甫在文中也同样表达了继承祖烈,积极进取的志愿:“幸遇圣主,愿发清机。以显内外,何当奋飞。”

杜甫移居后祭祖,并未祭奠其祖父杜审言,这应该是他当时矢志进取、欲在政治功业上有所作为的独特心态所致。因为杜预不但在政治功业和儒学上成就卓著,而且唐代还把其列为配享孔子庙堂的儒家先贤^[6]。他的外祖母则是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的孙女,义阳王李惊之女,而且义阳王李惊及夫人被武则天天下狱时,杜甫的外祖母“扉屦布衣,往来供馈。徒行悴色,伤动人伦。中外咨嗟,目为勤孝”^{[7]2325}。外祖父是唐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外孙^{[1]6034}。可见,远祖杜预、外祖母、外祖父在功业或血缘上都极为显赫,是家族先辈中在政治、儒学上最值得自豪的人物,杜甫选择三者祭奠,应该说是在欲以追求仕进心态下的精心之举。他的这两次祭奠不啻是面对先辈庄重宣告,要继承祖烈,承担起振兴门庭的责任,代表其心态由隐居漫游向入仕求进的一个重大转变。

(二)二年客东都,山林迹如扫

杜甫这时有《赠李白》一诗: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膾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1]76}

杜甫与李白初遇于天宝三载(744年),两人和高适有梁宋之游,此诗当作于这年梁宋游之后。如果按前云其父开元二十八年去世,守制25或27个月推算,当于天宝元年(742年)结束守制,

诗中所云“二年客东都”应是守制结束至和李白相遇这段时间的生活。这句中的“客”字颇让人不解,因为杜甫本身就属洛阳人,他在洛阳生活不应该称为“客东都”。如果做一个推测性解释的话,应是他移居后主要居住在城东的土娄庄,活动于洛城内,故云“客东都”。另外,从这首诗中的描述看,杜甫守制结束后的两年内已经不再以隐居生活为主,而是“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臃腥”,主动出游于洛阳城内,和王公名流交往,为人仕做准备。如当为此时所作的《李监宅二首》其一云:“尚觉王孙贵,豪家意颇浓。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1]62-63}这些描述可为“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臃腥”的注脚。

还应注意,杜甫曾与李白有“方期拾瑶草”之约,显然李白曾希望杜甫和他一道退隐求仙学道,但杜甫却表达了推脱的意思:“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可见杜甫此时的心态意在求进,虽对隐居学道有浓厚的兴趣,但心思并不在此。这颇有数年前李白面对崔宗之“我家有别业,寄在嵩之阳……子若同斯游,千载不相忘”^{[8]2906}相邀时的推脱“幸遭圣明时,功业犹未成……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李白《酬崔五郎中》)的意味^{[8]1814}。杜甫后来赠李白的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1]99}“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1]104},表明他确实没有践行“方期拾瑶草”的相约。

可见,杜甫移居土娄庄后,确实方便了在东都城内的出入,遂有了“二年客东都”之举。移居之举和心态变化显然颇有关系。

(三)拜见李邕

天宝四载(745年),杜甫又有一趟齐鲁之行,这次东行论者一般认为是追寻李白之故。但是他并没有先赴李白所居的任城(今山东济宁),而是先去了济南拜见李邕,这当也是他追求仕进的心态使然。

李邕是前辈文人中当时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且早在杜甫少年时即“李邕求识面”,对他颇为赏识。据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考,李邕开元二十九至天宝元年任滑州刺史^{[9]789},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744年)任汲郡太守^{[9]1421},天宝四载至天宝六载(747年)任北海郡太守^{[9]1079-1080}。滑

州治所在滑县(今属河南),汲郡治所在汲县(今河南卫辉市),这期间由于他的吸引,滑台、淇上一带文学活动迎来一个小高潮期。王季友《酬李十六岐》:“出谷迷行洛阳道,乘流醉卧滑台城……于何车马日憧憧,李膺门馆争登龙。千宾揖对若流水,五经发难如叩钟。下笔新诗行满壁,立谈古人坐在席。”^{[8]2890}王季友是杜甫的好友,李岐则是李邕之子。高适《鹤赋序》:“天宝初,有自滑台奉太守李公《鹤赋》以垂示。适越在草野,才无能为,尚怀知音,遂作《鹤赋》。”^{[10]297}高适当时在梁宋一带,称李邕为知音,并承李邕垂示新作,可见李邕对他赏识鼓励有加。从王季友的描述及他从洛阳到滑台与李岐交往、高适与李邕交往的情况中,不难看到李邕对当时文坛的吸引力和鼓舞作用。而此时杜甫正居住在土娄庄,约从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三载,其父亲、二姑母、继祖母相继去世,因家中事务较繁,他可能没有机会去滑州或汲郡拜见李邕。

天宝四载,杜甫处理完家中事务,李邕已转任北海太守(治所在今山东潍坊),他遂赴齐地,在济南和李邕相见。杜甫此行很可能有寻求入仕之助的目的。他《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中云:“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1]80}从“物役”“难重过”之语看,杜甫确实要打算入仕,所以预想以后难有机会和李邕再相见。后来所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当时情形云:“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1]4007}这次相见,杜甫不啻是接受了一次前辈的教育和鼓励,而且李邕还“酒酣托末契”,把自己的志节理想托付于杜甫。这对杜甫走向长安求仕,追求建功立业的理想,无疑是很大激励。

总之,开元末至天宝初,杜甫移居土娄庄后,他的行迹及心态和之前居住陆浑庄时四处漫游、热衷隐居的情形明显不同。移居背后显然有着转求仕进的目的,父亲去世、为其守制守墓,是触发这一转变的契机,他趁此机会,筑室首阳山下,实乃两得之举。移居这一空间距离上的变化,实际蕴含着与仕途疏密的心理距离上的转变。这是考察杜甫生平时需要注意的。

三、杜甫移居与唐代两京文人的居住风气

杜甫通过不同的居处以适应不同心态下的人生追求,这一现象其实在唐代两京文人中并不罕见,仅杜甫所在的洛阳,可考者就有宋之问、岑参、李颀、陈章甫、刘方平、刘长卿等多位文人拥有两处或多处别业的情况。置于这一背景下,我们对杜甫移居之举和心态变化的关系抑或有更明确的认识。

宋之问在洛阳一带的别业可知者有三处,即位于嵩山的别业、陆浑山的陆浑山庄以及首阳山的别业。嵩山别业距离洛城最远,宋之问从调露二年(680年)前后开始居住于此,并和杜审言等结为“方外十友”^{[11]193}。入朝为官后,他则没有机会再来此居住,如《忆嵩山陆浑旧宅》云:“一身事扃闼,十载隔凉暄。”^{[12]372}陆浑山庄距离洛城适中,在朝为官时也可在假日来此居住,如《寒食陆浑别业》云:“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12]590}《初到陆浑山庄》也云:“授衣感穷节,策马凌伊关。归齐逸人趣,日觉秋琴闲。”^{[12]576}位于首阳山的别业仅杜甫在《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中提及:“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1]49}宋之问在此的生活情形已不可知,但首阳山庄在三处别业中距洛城最近,他营建这一别业,当如《宴郑协律山亭》所云“朝英退食回,追兴洛城隈”^{[12]623},即为了满足“朝退追兴”的生活^⑧。

岑参在洛阳一带有王屋山青萝斋、嵩阳别业、缙氏山西峰草堂以及陆浑别业四处居所。《南池夜宿思王屋青萝旧斋》云:“早年家王屋,五别青萝春。”^{[13]312-313}岑参幼年时曾随父寓居晋州(今山西临汾),15岁时移居少室山的嵩阳别业^{[13]589},王屋山别业或此期间所建。《感旧赋并序》云:“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13]523}“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13]525}他15岁移居嵩阳别业,已有向洛城靠近的目的。岑参又有《缙山西峰草堂作》一诗,陈铁民先生推测:“玩诗意,作者早年居少室时曾一度移居缙山,诗即作于此时。”^{[13]9}缙氏山距洛城较嵩山更近,似有进一步向洛城靠近的意

图。他的陆浑别业仅在《巴南舟中思陆浑别业》诗中提及^{[13]463},不知建于何时,但离洛城也较嵩阳别业为近。总之,从岑参在洛阳一带几处别业的位置及营建先后,大致可以看到随着年龄渐长,求仕之心渐切,其居住地向洛城逐步移近的一个轨迹。

李颀在洛阳一带当有两处别业或田庄,一处是近郭的东园,一处是稍远的颍阳东川别业。关于东园,李颀有两首《晚归东园》:“出郭喜见山,东行亦未远……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14]207}“荆扉带郊郭,稼穡满东菑。”^{[14]579}这两首诗都云东园在城东郭外,当是指洛阳城东郭。因为孟浩然有一首《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闻君息阴地,东郭柳林间。左右瀍涧水,门庭缙氏山。”^{[15]150}诗中描述的李十四庄也在洛城东郭,傅璇琮先生、陶敏先生认为李十四当为李颀,并系此诗于开元十五年(727年)^{[11]433}所作。关于东川别业,李颀诗中多处提及,如《不调归东川别业》云:“惭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绂冕谢知己,林园多后时。”^{[14]200}这里所谓“不调”是指新乡尉任满后不调。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颀进士及第^⑨,开元二十九年前后离新乡尉任,遂归隐颍阳东川别业^⑩。按,李颀又有《缓歌行》《放歌行答从弟墨卿》两诗提及他在东川别业和东园(城东庄)的生活:

小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前任侠非。^{[14]277}

小来好文耻学武,世上功名不解取。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柏梁赋诗不及宴,长楸走马谁相数。敛迹俯眉心自甘,高歌击节声半苦。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14]296-297}

《缓歌行》似是进士未及第时所作,李颀早年可能有过任侠的经历,后来翻悔向学,在颍阳东川别业专心隐居读书达10年之久。《放歌行答从弟墨卿》则显然是已进士及第并入仕后所作,当是在新乡尉任满不调的初期。这时他对再次入仕尚抱有希望,所以“养鸡牧豕东城隅”,隐居在距洛城较近的城东庄。再结合《晚归东园》《不调归东川别业》所云,大致可见城东庄和东川别业

都营建甚早,当他处于求仕心态时,多居住在城东庄,常出入于城内,与“朱轮客”交游;当不急于出仕或仕情冷落时,则居住于较远的东川别业,追求隐居生活。

与李颀同时的陈章甫也是如此。他科考落第时曾有《与吏部孙员外书》:“但仆一卧嵩丘,二十余载。”^{[7]2789}吏部孙员外乃孙逖,他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十三年知贡举,书即作于此时。可见陈章甫早年主要在嵩山隐居。高适有《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所居》,陈十六即陈章甫,孙钦善先生认为诗作于天宝四载前后,开善寺在洛阳准财里(西阳门外)^{[10]136-137}。李颀也有《宴陈十六楼》:“西楼对金谷,此地古人心。”^{[14]544}金谷涧在洛城西北,和开善寺相距不远。两诗所云陈章甫所居和西楼当为一处,作诗时间也应相近。陈章甫又有别业在洛城西北的金谷涧附近,后来主要居住于此。《元和姓纂》载:“太常博士陈章甫,江陵人。”^{[16]348}可知陈章甫后入仕任太常博士。他早年隐居嵩山达20余年,显然是不急于入仕的心态;后在金谷涧别业居住,离城内较近,当是为求仕的便利。

刘方平是杜甫的同时人,主要居住在颍阳(今登封市颍阳镇一带)少室山西部一带。皇甫冉《寄刘方平大谷田家》云:“篱边颍阳道,竹外少姨峰。”^{[8]2821}大谷指大谷关^①,即今偃师市寇店乡界内的水泉关,其南临近颍阳。皇甫冉又有《与张諲宿刘八城东庄》诗:“寒芜连古渡,云树近严城。”^{[8]2804}刘八即刘方平^②。“云树近严城”当指临近洛阳城^③。可见刘方平也拥有距离洛城远近不同的两处居处。虽然他终生未能入仕,但城东庄当也是为便于回洛阳城内而建。

刘长卿在洛阳一带的居处可确知者有嵩阳别业,此据其《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可知^{[17]94}。他还在《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中提及其洛阳旧居^{[17]40},又《李侍御河北使回至东京相访》云:

贫居幸相访,顾我柴门里。却讶绣衣人,仍交布衣士。王程遽尔迫,别恋从此始……草色官道边,桃花御沟里。天涯一鸟夕,惆怅知何已。^{[17]49}

这里所云洛阳所居,不知在何处,但李侍御在“王程遽尔迫”的情况下相访,且诗云“官道边”

“御沟里”,应不会距洛城太远,当非远在嵩阳的别业。前首称“洛阳旧居”,而非“嵩阳旧居”,也可佐证此居处当非嵩阳别业。

总之,从宋之问等人的情况可见,唐代洛阳、长安两京文人既热衷于自由高蹈的隐居生活,也因在仕、求仕的原因需生活、活动于都城之内。为了兼顾这种双重形态的生活,他们多有在近郭和稍远的山林之地营建两处或多处别业的现象,入仕之心不急切时可居住在山林别业,在仕或着力求仕时则居住在近郭别业,便于出入洛阳。这是一个常见现象。杜甫从距洛城稍远的陆浑庄移居到近郭的土娄庄,应该说也属于这一风气。他居住陆浑庄时以“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的遨游栖隐生活为主,不急于入仕;移居土娄庄后,则“二年客东都”“山林迹如扫”,主要是一种都市交游生活,开始着力为入仕做准备。应该说他的移居和心态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注释

- ①陆浑庄即土娄庄之说由清人浦起龙提出,详见《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页、546页。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认同其说。后之论者多承袭之。
②详见耿元瑞:《杜甫与河南》,《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王帆:《土娄庄与陆浑庄考》,《草堂》1985年第2期;李殿元、李绍先:《杜甫悬案揭秘》,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葛景春等:《杜甫与地域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葛景春:《饭颍山到底在哪里?——关于李白〈戏赠杜甫〉写作时间和地点的臆测》,《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胡永杰:《杜甫陆浑庄即偃师尸乡土室(土娄庄)说质疑》,《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③洪业指出:“在杜诗中,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常被饱含感情地提到。这些孩子无疑是杜闲和第二个妻子所生。然而,对于直至744年仍在世的这位继母,杜甫诗文中保持了完全的缄默。我推测,这种缄默相当雄辩地说明了我们诗人的童年、青年和成年初期都没有在家中度过。”见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21页。本文推断陆浑庄、土娄庄为杜甫在洛阳一带生活时的主要居处,与其说并不矛盾。
④详见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31页。
⑤杜甫天宝七载(748年)至九载(750年)间所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云:“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尸乡馥土室,难说祝鸡翁。”他这时尚居住在土娄庄(即尸乡土室),距开元二十九年移居于此已10年上下。又在夔州

时所作《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云：“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为历云山问，无辞荆棘深。”说自从安史之乱发生后就没有再回过土娄庄。说明安史之乱发生前，他回洛阳还曾居住在土娄庄。详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161页、5052页。⑥如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宋本杜工部集》卷十题下小字作“时归在南陆浑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八《忆弟二首》题下作：“彦辅曰：时归在南六（陆）浑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九“宋族”和《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卷十九皆作“洙曰：时归在南陆（六）浑庄”；《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四则直接作为诗题中一部分：“忆弟二首时归在陆浑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四作“公自注：时归南陆浑庄”。⑦胡永杰《杜甫“早充观国宾”当为开元十八、十九年前后由太学获监举参加科考事考辨》中指出，杜甫14岁至19岁当有过在洛阳入太学的经历，见《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⑧关于宋之问的三处别业，详见胡永杰：《宋之问：别业与吏隐生活》，载《光明日报》2019年7月29日文学遗产版。⑨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二《李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4页；徐松撰，孟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八，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⑩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⑪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道三·西京一·河南府·洛阳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页。⑫参见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刘八方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6-157页。⑬“严城”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洛阳附近的城池之名，如《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县”载：“故穀城，在县西北。古穀城即周所置，在穀水之东岸，西晋省并入河南，故有城存。北齐天保中，常山王演使裨将严略增筑以拒周，俗亦谓之严城。”《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9页。二是泛指戒备森严之城，如韦应物《观早朝》：“伐鼓通严城，车马溢广躔。煌煌列明烛，朝服照

华鲜。”《广陵行》：“海云助兵气，宝货益军饶。严城动寒角，晚骑踏霜桥。”参见孙望：《韦应物诗系集年校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页、71页。这两个含义都可以用来指洛阳城。

参考文献

- [1] 萧涤非主编. 杜甫全集校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2] 洪业. 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M]. 曾祥波,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3] 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4] 刘昉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6] 胡永杰. 论杜预、杜审言影响杜甫的唐代现实背景[J]. 杜甫研究学刊, 2019(1): 61-68.
- [7]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8]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9] 郁贤皓. 唐刺史考全编[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 [10] 孙钦善. 高适集校注: 修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 [11] 陶敏, 傅璇琮. 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初盛唐卷[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2.
- [12] 陶敏, 易淑琼. 宋之问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13] 陈铁民, 侯忠义. 岑参集校注: 修订版[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 [14] 王锡九. 李颀诗歌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15] 佟培基. 孟浩然诗集笺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6] 林宝, 撰. 岑仲勉, 校记. 郁贤皓, 陶敏, 整理. 孙望, 审定. 元和姓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17] 储仲君. 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On the Transfer of Du Fu's Residence in Luoyang and the Change of His Mentality

Hu Yongjie

Abstract: Du Fu's known residences in Luoyang were Luhun villa (陆浑庄) and Tulou villa (土娄庄). He lived mainly in Luhun villa at first, and moved to Tulou villa in about 29 years of Tang Kaiyuan. The direct cause of Du Fu's migration was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But there was a deep reason behind it, that was the change of his mentality from pursuing seclusion to pursuing official career. In fact,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Tang dynasty literati to set up two or more villa around Luoyang or Chang'an to meet the needs of reclusions or in office and seeking for office in different states and mentality. The transfer of Du Fu's residence was similar to that at that time.

Key words: Du Fu; Luhun villa; Tulou villa; residence transfer; change of mentality

[责任编辑/周舟]